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学生运动

史料汇编

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

——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

——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

出版：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
编委：郑文波、赵燊儒、伍安、陈永標、郭仁德（故）、
李容德、許元芳、郭榮基、翁隆胜、蔡亚汉、
叶建国、陈家康、黄循营、李凤德、鄧耀增、
杨景水、卢崇衡。

责任编辑：郑文波、杨景水。

封面设计：叶玉佩

打字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承印：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定价：RM30.00

国际书号：978-967-5619-00-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愿以此书

献给那些奋斗在海内外为追求廿世纪五十年代学运斗争理念，争取教育平等，实现社会正义，公正民主和民族团结而努力的一切人士。

序

打捞五十年代华校学运的集体记忆

张景云

这是一本迟来的书。过去半个世纪里，华人社会关于华教运动的书籍，可说是多得汗牛充栋，体裁形式林林总总，评论者、编撰者、研究者身份背景纵使纷繁复杂，史实主体基本上已可勾勒出个轮廓，多数主要议题也已有趋同的归向。然而在这一片文字汪洋之中，唯独缺席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英殖民地当局蓄谋将华校改制而在半岛各地触发的华校学潮这一段历史。如果说马来（西）亚的华教救亡自强运动是从教总的应运而生肇始，那么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对时局具有高度警觉与危机意识的大批华校中学生自动自发的展开历时数年的爱校护教、反对改制、反抗殖民势力镇压的学生运动，这一大群“最早的燕子”的可歌可泣经历，他们的牺牲与历史作用，却何以会被遗漏在华教运动史的主流论述之外？难道五十年代的华校学潮成了诸多研究者的治史盲点？难道维护和建设华教只牵涉到教师、校董和家长，以及无数有头有脸的社会人士，而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特别是五十年前那许多响应时代思潮的感召、以身体力行作为学习、把学习突破校园围限的华校中学生，就无资格入史？

又或者华教历史已沦为个人崇拜的场域，已作古的先哲固然做了旗帜，现役领导也要成为标杆，其余的就都是“一条线，一条线，落在河里看不见”了。又或者五十年前的热血青年学生，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底下，情有可原的也都患了历史失忆症，以及政治失语症，必须经过近年国内公民社会运动的勃兴，方始逐渐苏醒过

来，而在近年孜孜矻矻的打开尘封的记忆库，把里头刻骨铭心的经历，一件件取出来在阳光底下曝晒。

争夺话语权

无论是有心或是无意所造成，华教运动史确实存在这么一块空白，而这本史料汇编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而呈献出来的。这本书后面的起意，就是要打捞沉没在国家论述和华教运动主流论述双重权威堆压下的集体记忆，拒绝遗忘，为五十年前那百千计的热血青年学生夺回话语权，不让那段灿烂青春和峥嵘岁月留下空白。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本质性状态就是权力关系，有的权力关系作用于分配社会与文化资源，包括其中最实利的经济资源，有的权力体现在话语的强弱有无上。各社会集团 / 势力对话语权的争夺，其终极作用就在于取决形塑一个国家 / 社会之形象（今天的形象就是未来的命运）的权力，说白了就是有权描述这个国家 / 社会是（应该是）个怎样的一个国家 / 社会；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描述，用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数据 and 方程式描述，用历史神话的迷思描述，用民族学的新旧学说描述，用政治现实的强权描述。种类不一，众说纷云，举例来说，国名在暹罗和泰国之间摆盪，就透露出对“这是个怎样的国家”，不同的当权势力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和观点。现代社会里争夺话语权的战场，除公权力的操纵与垄断，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和资讯媒介的较量上，这些都是公权力亟思垄断而又无法垄断的公共场域，对塑造当今与未来世代的民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历史该当如何写，本质上就是争夺话语权的问题，表现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上，这就是争夺未来世代的政治文化等价值取向，也无如说是争夺国家的未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窜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受到邻国的关注和公愤，因为所改出来的二战史观点与国际学术界的共识相违悖，然而窜改历史（特别是本国史）其实是世界各国极为普遍的现象，而这个问题正好说明，历史（历史学）如何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

历史遗产运动(heritage movement) 和历史 / 历史学是两座庙，所供奉的是两个截然迥异的神祇，后者以其自身为目的，为学术而学术，而前者则是运动者为现世的利益为目的，历史 / 历史学沦为被利用的手段。现世利益可能是政治性的，如修撰历史教科书所涉及者，也可能是经济性的，如保护实物遗产（借指历史）以促进旅游业。保护三宝山，保护吉隆坡新街场广福义山公塚，维护槟岛乔治市老街区，维护历史教科书里华人参与建国史实，都是泛政治性的现世目的，那是要保护集体记忆不让它湮没，藉以巩固民族身份认同，并由此参与描绘这个国家的多元性本质。利用历史 / 历史学的现世利益目的，既因人而异，正当性自也分殊，最恶劣的效果是破坏历史之真实于无形，较可取者如遗产运动中集体记忆的形塑与历史学效果趋同，或至少大同小异，破坏较小。

传统史学界訾议后现代历史学对历史学术的破坏，但后现代历史学（跟一切后现代论述那样）对人类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认识到（唯一与绝对的）史实的不可还原和难以逼近，主张把史实（历史本体）和史学（历史认识）结合起来，成为二位一体，因此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大大解放了人观察世界的视界与观点，在方法上用多维模式来作综合性描述，揭橥以用实证探讨为基础的诠释，而非求唯一之真实为目的。

拒绝遗忘

华教运动本质上是政治运动，它争夺的是国家资源以及塑造国运的话语权。它是民权运动，然而五十年代的华教史已经是个古战场，我们所争夺的是什么？如果说这本文集所呈献的是另类史，是为主流历史提供另一版本，是边缘书写，那么中心的版本又何在？英殖民势力的史料仍然尘封在吉隆坡和伦敦的各处官方档案中，对这一块并未割出一个史的轮廓，巫统政权五十年来始终是个外属内荏的伪强者，他们最害怕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五十年代学运人的较量对手是历史的缺席，是华教运动正统史对这一阶段的空白，仿佛维护华教的学运学潮不是华教的一部分，当年的中学生没有资格在

华教史中占一席位。读者手里这本书发出悲壮的呼号：我们拒绝遗忘。

这部书名为史料汇编，其主要的和占大比例的内容，当然就是相关的历史资料，这包括学运风潮的纪事和回忆，以及运动文献和参考文件，连当年同学们办活动时藉以互相激励的歌曲也选录在书尾。此外就是四位学者，时事评论人和新生代学运人于去年底在一个同一主题论坛上发表的讲稿，回顾、调研和比较兼而有之，这一部分或许可以为嗣后华教/学术界研究五十年代华校中学生学运学潮开启端绪。

纪事篇和回忆篇两个单元的文字，异中有同，而又同中有异。若依作者们和编委们的说法，其分殊就在于纪事文章中处处照顾客观的状写，和盘托出当年学潮的实况，所表达的激情也是“原汁原味”。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其特殊身份为历史留下文字记载，用英字短语说就是所谓present at the creation，是一种见证者的证词。老照片会泛黄，记忆会斑驳褪色，我想我们也不必刻意追求客观，不必讳言这部书里的一篇篇文章，都（只）是“我方的历史”，然而面对这方那方强势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遗忘，这又是何其强有力的无可抹煞的证词。当年组织和参与学运的华校中学生，是历史上的弱势者群，他们不计成败，或者根本没有成败的观念，挺身以卵击石，数以百千计的同学舍身牺牲，成仁取义，变成华教运动史上的白血球群，无数人更成为终生的苦主。感谢后现代论述，弱势群体也可以有弱势群体的历史。

四点意义

今天我们以半个世纪国内时局演变的认识来回顾当年所走过的道路，其时代意义的内容大约可以缕析如次：

其一是爱校运动。钟灵中学在全檳各华文中学之中是领头羊，钟中在战后复办后不久就有级长会议之设，又陆续组织如戏剧研究会、学报社等各种学艺团体，学生实行自治和主动学习，对校方争取建设优良学习环境；英殖民当局在当年地缘政治议程的驱使下对

华校 / 华校生采取敌视的态度，一见风吹草动就强悍高压，遂逼将钟中学生的学习劲头引向爱校护教运动上去。我们可以相当自信的推断，假如没有发生动荡性的1956 / 1957年学潮，钟中的优良学风迟早会蔓延到其他各友校，事实上各校早已出现严格的级长制、活泼的壁报和读书会等活动，甚至初中阶段就已有。

其次，华教运动。当年华校中学生的觉悟性高，对爱护华文教育具有宏观认识，如1955年在槟岛联合街坊孟兰胜会（中元节）组织举办为南洋大学筹款，1956年又为教总筹款建办公大厦的献金点唱运动，同年更巧妙配合英殖图谋算计华校的登记适龄学童计划而因势利导转为“火炬运动”家庭访问运动，达致开发华校生源，都属于第一层次的华教运动。华校面对英殖当局的变质阴谋，中学生学运从建设模式转为捍卫模式，因而才被逼迫转入与英殖势力直接冲突的狭路。

第三，反殖运动。1950年代，即使到马来亚“默迪卡”那年，或是独立之后若干年，国内许多领域的马来亚化也尚未推行，殖民主子仍然主导种种施政，一系列国家主义教育政策既漠视华教的悠久传统，也不承认华教在独立新国家中所应享有的基本公民权利，就是残余英殖势力结合巫统封建新贵们祭出来的杰作。钟中1955年在特别津贴一役中失守，没隔几年半岛各地华文中学就纷纷沦陷而接受改制，是则1957年接受火的洗礼的华校中学生，都对学运行动的反殖抗暴性质没有疑问。

第四，左翼运动。参加1957年蔓延半岛各地的学潮的大多数学生都不是具有明确的左派思想意识，只能说左派意识及其影响在当年的华文中学中颇为广泛和普遍，然而很多从事组织串联和推动工作的同学显然是左翼分子。这些人当中，有人被开除后直接投入工运和左派政团，有人被囚禁在获释后也投入左派党团，如劳工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成为左翼政治运动的中坚分子。

如何反思

时移势易，今天的华教运动会以怎样的视角来审视五十年前那

一场华教中学生的学运 / 学潮，后人不一定更有智慧或即使只是事后诸葛来评说前人的事。其实今天的华教运动已经不是数十年前的铁板一块，董教总往昔清颯高蹈的权威领导地位，在经受多年主客观因素的冲击之下，时至今日已今非昔比，稳定下面其实也暗流汹涌，而与五十年前反对改制斗争相呼应的则是，今天六十所独中的办学路线根本是各师各法，非权力机构的董教总，对此也只能存而不议了。今人有能力以今日之是去非昨日之非吗？恐怕不能，因为今日之是真的是了吗，这还是个争议不休而尚无定论的问题。

胡万铎先生说，他无畏无悔，这是遥想当年曾经无畏，深感今天诚然无悔；我想那无悔的部分应该包含爱校情怀，反对改制，反抗英殖民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没有多大争议的。然而当年的学生运动还有其他内容（请详本书宋辰文），如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新中国这个新生事物的向往等，但这二者也不一定等同。盱衡今天世界大势，昨天河东今日河西，左右易位，即如近日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一向坚持“不修”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早已有人提出其当前所实行的政经纲领，有多少成份已扬弃、又有多少仍保存原来标榜的社会主义精神？少数人富起来之后会不会使贫富差距愈益严重，阶级矛盾重现？今天中国的面貌当然不止于这个向度，错综复杂，此处也毋庸赘言了。面对今天如此世局，当年的青少年左派份子是否有了修正的看法？十六岁不红就是无心（对民间疾苦无动于衷），六十岁仍然红就是没脑（不会思想，不了解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大势），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对这一组问题思索多年，所得到的一点小结论是：把社会主义约化为最低公约数，去掉了层层意底牢结(ideology)的外衣，那只是一条最简单的诉求，就是社会正义，而这是永远不会失去时效的诉求。社会正义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剧烈的阶级斗争手段去达致，也不能像在马来西亚这样恶质化的种族政治格局下沦落成为种族主义斗争或种族间的博弈，更不能像有些人那般自圆其说的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今天是种族协商政治的时代”。老左们不是政治恐龙，他们有智慧体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商做生意，那是人的生存策略，

不是人生事业，若用这生存策略消解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那是真正的无心又没脑。他们若是经商致富之后，把经商致富当成自己的人生目的，那是背叛青年时代的自己，违背当年青春的理念。老左们不当政治恐龙，意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鼓余勇，散发余温，仍可在各自的人生疆场上，略尽棉薄。

历史宿命

对一桩历史事件进行历史反思，是一种尊重其事其人的工作，我主张这里也应该引入小说家们所说的德性想象(moral imagination)，因为一切冠上历史名称的“人的工作”都太欠缺个体人格(impersonal)，太沉重了。五十年前参与学运的同学们是否都很幼稚，都不知天高地厚，都不懂讲究斗争策略，都不会“见好就收”，都不守本分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华教的事让大人来管”）？然而在那风雷激荡的时代，这百千计的同学们偏偏就像扑火的灯蛾，眼前只有一团火，在他们的对立面，是临撤退前阴谋留下某些政策遗产的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和本土封建种族主义集团的勾结，这种强弱悬殊的遭遇和碰撞，只能说是历史的宿命。

世上有多少人，有多少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学生，具有学识与思想上的装备，足够让他可以摆脱时代/历史，像鱼跃出水般生活？而那又是个怎样的时代？那是“公办衙”、身后曳长辫的妈姐、Whitelaw洋货公司的年代，那是澳洲空军和英国海军在号称“东方花园”的槟城丹絨武雅作日光浴的年代，那是曹兮写市井小说、梅井写马来文化研究、写辛辣杂文的冰梅被驱逐出境的年代，那是诗歌和散文洋溢着默迪卡呼声的年代，那是《沙漠风》和《耕耘》的年代（当然也是《中国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年代），那是华玲和谈的年代，那是介绍印尼短命革命诗人凯里尔安华和五十年代行列马来作家的年代，那是川行书店可问到中国大陆书籍水货的年代，那是打金匠、木匠、商店学徒、码头工友都可能是文艺青年的年代，那是曾梦笔编《夜灯报》、傅无闷编《新报》的年代，那是……。

大概就是在这样以及我的记忆暂时未能唤醒其全部“喧嚣与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时代背景下,1956年初,我插班入读韩江中学高中一,初识了一群可亲的学习伙伴,其中有一位绰号叫咩咩的,他带我在日本横街生活公市理发和吃廉价米粉,剪个头三角,炒米粉角半。咩咩也带我去他的家,那是在大街一幢老式四、五层楼的大杂院,像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的老楼,他妈妈在隔邻漆木街一间街角咖啡店前摆档卖麵;我估掂由于从小在这靠近码头和洋行的街坊闯荡,他那时已经锻炼成一个干练小子,让我这个在菩提小学做了六年寄宿生的浑小子好生羡慕。其实他除了是个小精灵,“觉悟”显然也比一般同学高。然而1957年底的那场学潮已与我无缘,算是擦肩而过,事缘我已于早一年底因校内一件小风波而被开除,1957年杪我已在玻璃市一个一条街的山城当临教餬口,后来只是假期返槟时从同学口中得知一二。人生蓬飞萍转,再见到咩咩,那已是1959或翌年,我又从槟岛南下新加坡,乘载蔬菜罗里在薄暮里出发,破晓时司机大哥把我丢在巴生河畔大巴刹,续程南下前在附近溜达,我在仙四师爷宫后面小巷的人丛中惊喜的见到了他。

“我们无处安放青春”,这是时下中国流行的时尚文艺腔,这里借来一用,五十年代华教学运人那一世代的青春又将安放于何处?他们将自己宝贵的青春献上了华教运动的祭坛,俯仰天地之间,始终无悔初心。本书是一阙悲怆壮烈的招魂曲,五十年代在学潮中牺牲的华教少年志士们,魂兮归来!我以颤抖的笔写下这篇蕪文,心中怀着无比的敬意。

2009年10月初

我们的话

工委

在举国人民迎接独立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怀在五十年前的这个时刻，伴随着“人民要求自由，国家要求独立”的浪潮中，有一股激昂澎湃的反抗英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青年学生力量，掀起了我国历史上最久和最具影响的一场学生运动，从此亦奠定下日后全马人民维护民族教育生存的基石。

1957年11月14日全马华校生所发动的这场规模空前，轰轰烈烈的捍卫民族教育运动，正是这股力量的写照。

当年许多热血沸腾，热爱华教却遭受无理逼害的青年学生，如今都已步入高龄，其中却有不少人都曾是或仍是社会团体领导人，文教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学术界菁英、教授，对国家社会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重提50年前那一段刻骨铭心、叫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应具特殊意义。这是国家历史上不容抹灭的纪录。也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配合“要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自由平等”的斗争中的一部不可分割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军重返马来亚后不久，实施紧急法令进行残酷镇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

这期间，英殖民政府及其代理人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华校的教育报告书与法令，如1950年臭名昭彰的“荷格(Holgate)教育报告书”，1951年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报告书和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等，都露骨地欲施行将华文学校改制为英校的计划。种种迹象都明显地表明了华文教育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民族教育和文化处于极严峻的局面。就在此刻，林连玉

先生领导教总和董总，结合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成立华教三大机构，推动华社维护华文教育运动。

从1953年起为维护民族教育大业，新马华社各界人士，群起支持创办南大，整个华社风起云涌，影响广大。全马各地华校学生，积极投入，经过为南大义演，火炬运动及槟城筹建教总大厦的活动，广大华校中学生对华教的前途和生存极为关心。

1955年7月18日钟灵全校同学于上午举行集会要求校方放弃接受特别津贴，提呈备忘录给该校董事部，主动愿意提高学费以舒解校方的财务困境，但被校方无理拒绝。与此同时，为配合全马各地华校生为南大义演的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在槟城各华文中学学生中展开，钟中学生更是主力军。不料8月11日深夜槟城三家华文中学的11名学生领袖被捕，此事应与钟灵持别津贴和各校学生联合筹办南大义演有关，当时钟灵有7人被扣并被开除学籍，其中六人被驱逐离槟，钟灵生称“七君子”，也即是“8.11”事件。当局的无理迫害，学生们愤懑不已。

1956年8月间，全马华校生，受教总的号召，沿门逐户展开“火炬运动”，呼吁华人家长送子女进华校，反应热烈。在运动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验了英殖的无理和霸道，感触尤深，全马华校生由此对殖民主义者蓄意消灭华文教育的意图，认识得更深刻，维护华文教育的心意因此更加坚决。

槟城钟灵中学当时已被当局蓄谋列为华文中学改制的首要对象，1956年6月间钟中正式接受改制的消息外泄，钟灵同学义愤填膺，广大华社哗然。跟着传来芙蓉振华中学亦步后尘，而后又有昔华中学紧随……，“改制华校”的骨牌效应开始产生了，华校不稳，华教危矣。深受华文教育熏陶的、向来站在时代前哨的钟灵生，在赤裸裸的严峻现实面前，在邪恶势力的操纵和威迫下，他们深知紧急法令下的白色恐怖是如何残暴横行的，也宁愿抱着“牺牲小我”，为唤醒广大的社会人士关注华文教育面临的危机，他们赴汤蹈火，愤而激起，被迫于当年的11月23日掀起了罢课学潮。

“11.23”学潮的爆发，吹响了全马华校生维护民族教育，反对

改制华文中学的号角。隔年1957年4月2日至4日，钟中学生一连三天再度罢课，进而激发韩中、中华等校同学起而响应，于4月4日发动了“4.4”学潮，同情声援钟中学生，学潮范围扩大到三校，形势越发不可收拾。不满和愤懑的情绪已充塞在槟城各中学的学生心里，也感染了半岛上的广大华校生。

在独立前夕，英殖民当局及其代理人又宣布取消华校高、初中(华文)会考，改为用英文为考试媒介的高初级教育文凭来取代，堵了华校生的出路。此外又驱逐无辜的超龄生出校，断了超龄生求学的愿望。尽管到了我国即将宣告独立之时，英殖民主义者消灭华校的恶毒手段更变本加厉，他们气焰嚣张，加紧推行各项不利华教的政策。压制越来越紧迫，为了维护民族教育，争取读书权益，反对迫害，同学们个个悲愤填膺，星星之火燎原，沉默的火山终于爆发。

1957年11月14日槟城四间华文中学生率先发动了抗议大会，同学们的罢课和上街引发了学警冲突，多名学生被殴伤和遭扣捕，同日吉隆坡四家华文中学生也举行抗议大会。11月16日怡保三家华文中学生跟着也举行罢课和上街抗议，事件越演越烈，局势蔓延迅速，引起全马华文中学生的共鸣。从11月14日开始，全国各地从槟城、吉隆坡、怡保、麻坡、居銮、峇都巴辖、笨珍、利丰港、新山、马六甲、芙蓉、金宝、华都加也、亚罗士打等地的华文中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起静坐、抗议、罢课、罢考、游行等等不同形式的行动，掀起了全马性的前仆后继的反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学生运动，激发了从北到南的全国性学潮，事件历时长达一个月之久。估计当时参与这场运动的同学超过2万人之多。这场学潮，我们称之为“11.14”学生运动。

这是一场维护民族教育，捍卫华教运动史上悲壮的诗篇，更是许多华校生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一役”，事后共有数百名华文中学生先后被开除或被捕入狱，许多被囚禁长达十年，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这项可歌可泣的事迹，轰动了全国，是全马华校生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爱校的正义进步运动。

必须指出，我们发起纪念50年前的这一史实，是为了记载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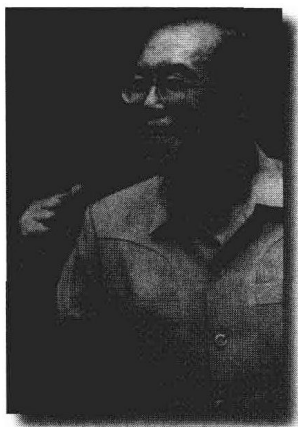
华校生有过这段骄人的历史，有过这件振奋人心的事件，更让后人能知道我国的各民族人民，尤其是华裔公民和华校中学生，在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教育平等的斗争中，曾经如何敢冒艰险、忍辱负重的奉献过他们的青春。历史将会以客观的态度，公平合理的给予这些事件一个正面交代。

我们始终坚信，“维护民主自由、捍卫和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也是时代大势所趋，任何强权、暴力和逼害都是螳臂挡车，历史的巨轮是不断前进的。

我们缅怀那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热血青年学子。历史会永远记得您们。马来西亚人民以您们为傲。您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光辉，肯定是无怨无悔的。

摘撰自《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文
2009.9.9重修

无畏无悔



胡万铎

2007年我们发动主办了《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50周年纪念》，旨在号召曾于1955至1957年间共同参与捍卫华教运动的同学欢聚一堂，缅怀过去；同时亦希望能让这段历史有个完整的纪录。今日这一夙愿总算完成。

50年前是一个思想转变的大动乱时代，也是新与旧的交替时代。每个人都受到新思潮、新时代的洗礼，而反殖反帝热潮高涨。我们当时都是年青的小伙子，血气方刚，民族意识强烈且富正义感，不平则鸣。

记得1955年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华文教育的发展，甚至企图消灭华文中学，而钟灵中学则首当其冲。当年在籍同学听到母校要接受津贴，怕母校丧失办学主权，便展开行动规劝，不料，事件竟殃及槟城各校11名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即“8.11”事件），当时钟灵有7名同学受难，时称“钟灵七君子”（注）。在下忝陪末席。

1956年12月23日，钟灵学生不堪受辱、受迫害，愤而发出怒吼，集会怀泽堂抗议，遭到英殖政府的强硬镇压，发射催泪弹驱散，事后共有68位同学受到开除处分，是为“11.23”学潮。隔年4月2日到4日，同情学潮掀起，事件蔓延到韩江、中华等中学，事件有扩大之势。

殖民当局在撤离马来亚前，疯狂实施诸多不利华教的措施，